

■ 黃 焯 雄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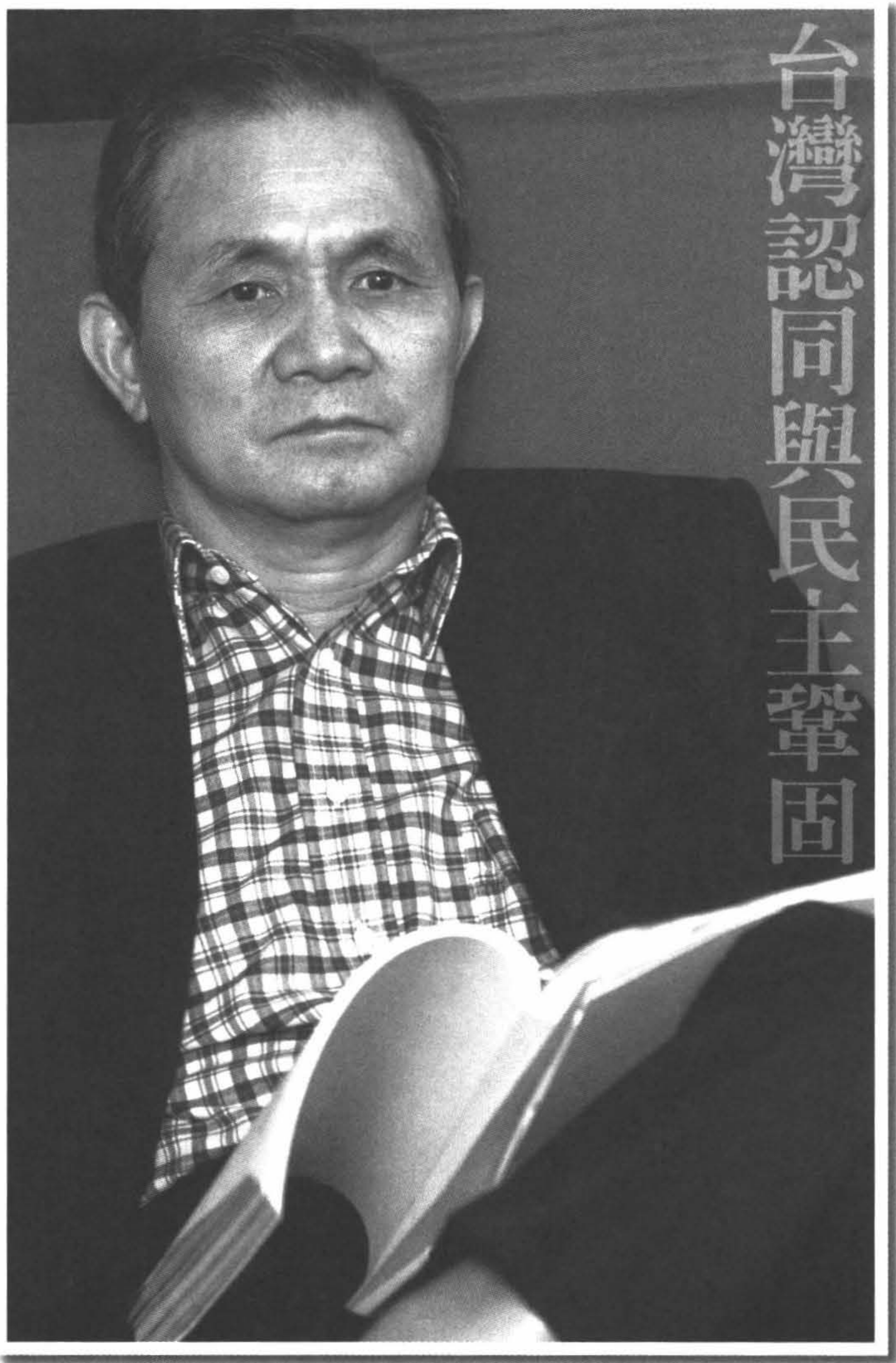
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

曾任第三屆監察委員、台灣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國民大會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

一九七〇年代即參與黨外，並從事台灣近代史的紀錄工作。

代表著作有《兩個太陽的台灣——非武裝抗日史論》、《蔣渭水傳——台灣的孫中山》、

《還財於民：國民黨黨產何去何從？》、《在哈佛的沉思：從世界看台灣》等多本著作。



「二〇〇六年，執政者爆發一連串貪腐事件，讓我開始深思，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黃煌雄說，他接著四處走訪民進黨基層黨工，想要知道這些長期以來就相信民進黨、可以說為民進黨賣命一生的人，怎麼看待執政後的民進黨，「我聽到的聲音是『很鬱卒』、『心很痛』，」他感慨，檯面上的人真是「愧對從黨外運動一路走來、始終相挺的這些人。」

黃煌雄說，現在的民進黨需要重新找回「黨外精神」，否則如何再一次贏回人民的信任與支持？而所謂的黨外精神，他認為有三大核心：一，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反對特權，追求公道；三，堅持本土，永續經營。他說，永續指的是基於對台灣這塊土地恆久的愛所產生的經營態度，「不是指政權。」，黃煌雄並且認為，這樣的「黨外精神」並不專屬於民進黨，「誰執政，誰就要遵守。」而這種精神「應該構成台灣精神的重要內涵。」

檢討執政之後的民進黨，他指出，拾回黨魂是一個迫切的任務。黃煌雄轉述一位基層黨工的話說：「在黨外運動時，很多人有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慷慨、浩然之氣；現在看看一些在高層的人，心裡所想的大概是『我不進天堂，誰進天堂』。」

這種轉變讓很多支持者憂心、傷心，但黃煌雄相信二〇〇七年年底立委選舉的大挫敗，是民進黨反省的開始，而他認為，其實不只民進黨有所警惕。他說，當他看到「勝利的國民黨不敢驕傲，失敗的民進黨得到教訓」時，感受到台灣人民藉著選票展示出「自己才是國家主人的意志」，這股力量非常巨大，政黨不能不屈服，「你何時看過兩大政黨同時向人民這麼謙卑？」黃煌雄帶著十分篤定的神情說，這就是台灣民主的曙光，「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或許有些讓人不滿意的地方，但總體而言，方向是往前進的。」

黃煌雄以自己的經歷說明他對歷史總會往前走的樂觀期待。一九八〇年，黃煌雄競選增額立法委員時，競選的看板寫著「國民黨往何處去」，結果看板竟被砸爛；一九八〇年代，他在英國看到一本書《帝國的結束》，心裡很受震撼，自問：「一個帝國都可以結束，又何況是一個政黨、一個人？」於是，一九八六年，黃煌雄出版了《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一書，結果書被禁了，「可是，才不到十五年的時間，政黨輪替就真的發生了，「自由、民主、本土，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但是面對著目前一些「階段性的逆流」，黃煌雄還是期許能有更多知識分子投入關心，一起努力扭轉，「戒嚴時期都有那麼多人勇敢發聲，現在還有什麼好怕的？！」

台灣認同與民主鞏固

——黃煌雄

一、十年前的預言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日，我應邀在美國新英格蘭中華民國學人留學生的「學術論壇」，以「跨進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治展望」為題發表演講，當時我勾畫出跨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政治的新面貌，大概具有六項特質，其中第四項為：「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時代的來臨。未來要在台灣政壇上生存發展，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很自然且帶有感情的說『我是台灣人』的人；另一種是很自然且帶有感情的說『我是台灣人』的人。在此，『台灣人』的定義涵蓋四個族群，包括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河洛人）與新住民（外省人）。如果只肯說『我是中國人』，卻不肯說『我是台灣人』，這些人大概都漸漸會為政治情勢所淘汰。」

從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選舉到二〇〇七年，十二年以來，就國內政治發展而論，特別是就享有公信力的像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中

央研究院有關研究人員所調查公佈的資料，均顯示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已由一九九六年百分之二十多升至二〇〇〇六年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以上；而自認為中國人者，則由百分之三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十以下；自認為兩者都是的人，大約維持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但亦有降至百分之三十五的紀錄。這些調查數字反應出，我在十年前所作的預言，似乎正全面實現中。

二、總統選制的雙重影響

一九九〇年春，民進黨成立憲政研究小組，小組成員經過深入的討論，特別是有關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深刻交鋒以後，提出民主大憲章，主張總統應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產生，而確立總統為憲政中心的制度。這項主張引導了國是會議的決議，影響了社會共識，衝擊了國民黨，終於在一九九六年完成我國史上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當時我們對這項憲政主張的主要考慮包括：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因素；凝聚國民意識、強化國民向心；有利於民進黨提早競爭中央政權。就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以及自認為台灣人比例愈來愈高，而自認為台灣人的台灣認同更高達七成、八成以上的民調來檢驗，我們當年的戰略評估可說是完全正確。

但身為憲政研究小組召集人的我，應該坦承我們當年雖傾盡全力推動總統直選，但對民選產生的總統，其職權的行使和制約卻缺乏深刻的檢討，也缺乏應有的配套準備。我們直覺認為，像我們這樣在威權統治下追求民主的伙伴，不管是誰，一旦有機會取得政權，一定會珍惜台灣人民所賜予的機會，竭盡全力，履行三代台灣人所夢寐以求的目標，造福人民，提升國力，將台灣帶向國際舞台。我們心中想到的是，一九五八年東山再起，二度拯救法國，並將法國帶向富強、繁榮與光榮的戴高樂的投影；我們缺少美國制憲祖先那種對權力戒慎恐懼的態度與探討；也正因為這樣，像美國「聯邦論」所呈現的那種唯恐去掉一個英皇、又換來另外一個皇帝的憂慮與辯論，在我們的「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法草案」的實錄幾乎完全從缺。

由於民選總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絕不是戒嚴時代的總統，及日治殖民時代的總督所可比擬，因此民選總統行使憲政職權，乃受到了高度的期待；何況，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是在訴諸「台灣人的悲情」下高票當選總統；二〇〇〇年陳水扁則是在國民黨分裂下，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才當上總統職位。在這種激情的背景下，他們就職時，幾乎得到善良的台灣人民，包括同行的民主伙伴完全的信任，當時幾乎沒有人擔心或懷疑民選總統會逾越職權、逾越分際、進而濫用職權、濫用特權、使自己成為政治爭議的中心與泉源。

三、民主鞏固的真實課題

(一) 台灣人VS.中國人

一九九六年的總統大選是在外部中國飛彈演習砲火下進行，內部雖有競爭，卻不激烈，也不緊張；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是在國民黨分裂以及興票案陰影下進行；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則是在三一九槍擊案的震撼中完成，泛藍與泛綠的互信因而徹底瓦解；二〇〇八年的總統大選，由於民進黨立委與總統初選採取排藍規定，竟出現台灣人VS.中國人的新因素。

就歷史發展而論，日本有效統治殖民地下的台灣，是台灣人一詞及其概念產生的根源。起初，台灣人係相對於日本人；「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係相對於外省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以後，台灣人係相對於PRC的中國人。日本學者若林正文把日治時代的「日本人」、「二二八」之後的「外省人」、PRC下的「中國人」，均稱為「台灣民族主義」的「他者」。

依據這種闡釋，台灣人民包括原住民、福佬人（河洛人）、客家人及新住民（外省人），如果少數政治人物有意將台灣人和中國人對立，且又將支持泛藍的人民排除在台灣人之外，則這種二分法不僅曲解台灣人的定義，窄化台灣人的包涵性，更與民調所顯

示自認為台灣人達六成以上，而自認為台灣人中具有台灣認同更高達七成、八成以上的趨勢與走向大相逕庭。所以這種立論，只能說是政治操作，或是選舉語言；而台灣認同與「藍綠對立」、「統獨對立」理應脫鉤。

(二) 文化認同

戒嚴體制為民主鞏固遺留兩大嚴厲課題，這兩大課題且越來越凸顯：一為文化認同、一為歷史記憶。

由於國民黨是帶著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以及大中國意識來到台灣進行統治，自然視台灣為復興的基地、反共的跳板、中原的邊陲、歷史的支流。台灣在長期被矮化、地方化、局部化、工具化的過程上，台灣意識被壓下來，幾乎窒息。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推動，特別是總統直選實施以後，台灣意識一步一步上揚，民進黨中央執政以來，在資源配置及政策順序上，台灣意識後來居上，大中國意識開始感受到壓抑，在教科書的修改過程上，隨著台灣意識與大中國意識比重的調整，以及定位的爭論，更爆發出所謂「去中國化」的激烈爭論。

(三) 歷史記憶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大的創傷，列為最高禁忌，民主化以後，禁忌的缺口打開了，由於不同族群對「二二八」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加上總統大選又是緊隨著「二二八」日期之後的三月中旬舉行，時間的接近性，使「二二八」事件自一九九六年

以來，一直成為歷次總統大選引爆的焦點議題之一。

蔣氏父子在台灣將近四十年的威權統治，在不同族群之間也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像最近中正紀念堂拆匾所引發的對立與抗爭，都深深反應出對待歷史事物，因不同族群的不同記憶，正逐漸浮現成為台灣民主鞏固必須克服的重大課題。

四、挑戰與回應

當前民主鞏固所面臨的挑戰是真實的，也是令人不安的，回應之道要從多方面，包括制度層面、慣例層面以及精神層面。

首先，總統選舉應該改採絕對多數，第一輪如無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半數，應即就第一輪前兩名進行第二輪選舉。這也是臺灣憲法草案的主張，這項絕對多數制的用意，主要在於強化民選總統的代表性、強化政治與社會穩定、及防止候選人恣意操弄族群或特殊敏感議題。台灣經過三次總統大選的實際體驗，這項修改是很有針對性，也很有必要。

其次，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儘管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但基於憲政歷史與民主原則所蘊涵的精神，應建立憲政慣例，交由國會多數黨組閣。

英國憲法學者戴雪 (Dicey)，區分英憲為兩大類，其一是「憲法」(Law of the

Constitution)，其二是「憲典」(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前者包括法院所承認及施行的規則，這是憲章所有法律本體；後者包含風俗、習例、格言或教義，這是憲章所有道德，而不屬於法律的領域」。在我國，總統選舉僅僅舉辦過三次，總統人選僅僅經歷過兩位，他們對總統職權行使的態度、運作的方式、以及留下的言行，都會對總統選制產生影響；坦白地說，陳水扁總統七年多來行使總統職權所留下的「陳水扁模式」，對總統選制代表一個負面的因素。因此我們希望馬英九、謝長廷兩位總統候選人能公開宣稱：他們如果當選，在行使總統職權時，將會以有利於鞏固總統選制的方式來運作。像我們這樣年輕化的民主國家，像總統這樣重要政治領袖的行誼，對民主鞏固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在一個「政治家缺位」的年代，台灣太需要政治領袖，以睿智的見解與可貴的行誼，造成風氣，蔚為共識，形成有如英國憲典那種似無形卻又有力的慣例。

黨外精神是台灣精神的重要內涵，更是支持黨外與民進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並逐步取得中央政權的最主要支柱，其核心內容有三：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二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三為台灣主體、永續經營；所以「民主、公義、本土（永續）」不僅是黨外所遺留的最寶貴精神遺產，更是民進黨創黨以來所堅持守護的核心價值。在當前的階段，「民主」的追求已告建立，而「本土」認同也蔚為共識，現階段應不斷全

力以赴的，便是追求「公義」。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為了「追求公義」，黨外曾反對特權，反對貪腐，反對國庫通黨庫；同時由於黨外長期處在被壓迫的地位，屬於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黨外一向關懷弱勢、要求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強調四大族群，尊重多元文化，更主張社會正義、經濟正義，「追討黨產、還財於民」。今天，民主鞏固最敏感的神經地帶，便是基於族群人口結構的不均衡，所引發的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的衝突，特別是在像總統大選這樣的季節，如果有人，不管是哪個黨派，或哪些人，針對台灣民族性格心理的了解與掌握，以歷史因素所留下的基礎，有節奏、有計畫的操弄，不僅會在總統大選過程上爆發不可預料的驚心動魄的畫面，更會對總統直選制度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這也構成對黨外精神的根本違背。因此基於維護民主體制、總統選制，台灣急需重振黨外精神，培養互相包容與尊重多元的文化，讓任何操弄者在包容與多元的文化涵蓋下失去空間，沒有立足之地。這是台灣在民主鞏固旅程上當務之急。

台灣人基本上是憨厚、老實、善良、樸素、不硬拗、不伶牙利嘴、不粗話罵人，也不以別人的「姓」及「名字」取笑對方，更不罵及別人的祖先與逝者，這些傳統價值仍存在台灣人的內心深處。這些傳統價值如果經由媒體的報導與輿論的喚起，能夠普及擴大，成為社會的共同美德，將會匯成為無形的巨大社會約束力量，讓所有公眾人物，都

不能不望而生畏，恭敬地表達尊重。

解嚴之後的媒體，現在比任何時刻更需要承擔起來第四權的角色，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媒體的倫理責任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目前許多導致人心不安的來源，卻多來自媒體，媒體似乎給人一種感覺：「破」的力量有餘，「立」的力量不足。

司法品質與司法獨立，都會影響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公信力愈強，經由法治對民主鞏固所起的作用就愈大。解嚴之後的司法，雖然解放了對司法品質不必要的束縛，釋放了更大的司法獨立空間，但司法公信力仍然在爭議中、挫折中，進與退之間蹣跚前進。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司法顯然還沒有建立讓所有當權者與人民大眾都望之儼然的一種充滿著浩然正氣的公信力。

五、結語

放眼未來二十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機構，從擔任過卡特總統特別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到擔任過美國聯準會主席的葛林斯班，到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到歐洲與日本的政界與學界人士，幾乎不約而同地指出，未來的全球化，美國的色彩將減弱，亞洲的色彩將增加，中國的投影將更大，中國將成為美國在經濟上最主要的競爭者。這是台

灣所必須面對的真實的國際環境。

在這種新的背景下，台灣更必須不分黨派，不分族群，共同努力營造成為一個「民主、公義、本土（永續）」的社會，成為一個具有生存價值與意義的地方，這是台灣的生存之道，也是台灣唯一可行的單行道。政黨輪替以來，由於理想夢碎，不少人感到失望與茫然；政治人物公共形象的急速下墜，也讓不少人愈增對政治的疏離與冷漠；而選舉季節的口水與對立、操弄與撕裂，更令人焦慮與不安；解嚴二十年之後的台灣，竟然走到這個地步，不能不讓所有民主工作者捫心自責。

不過，從宏觀的角度看，解嚴後二十年，台灣基本上已是個走向自由、民主、開放、多元、包容的社會，這是歷史主軸，也是不可逆轉的主流，在這過程上，也許會出現一些逆流，或一些選舉併發症，但整個潮流卻是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只要台灣人民能延續台灣精神，守護台灣傳統價值，強化台灣認同，維護民主體制，展現國家主人的意志與力量，台灣在民主鞏固的旅程上，必當能夠在悲觀的質疑中，走出樂觀的未來。

特別值得慶幸的，二〇〇八年立委與總統選舉之後，四年之內，台灣不會再有中央層級的選舉，這是十多年來難得的機會，可以讓人民休養生息，也可以讓未來國家領導人有歷史機運來從事民主鞏固的堅實工程。